



中间等级的崛起与近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

王浩斌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中产阶级或中间等级往往被人们直观地理解成“白领+小老板”,很少有人会将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这其实是历史语境的不同所造成的理解差异。实际上在中世纪后期,中等阶级成员并不仅仅是“小老板”,而是指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工厂主、商人、农场主。他们在早期被称作市民阶层或资产阶级。这个市民阶层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先驱和代表。中间阶级作为一股最要的社会力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甚至是最根本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现代性的化身。

关键词:中间等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4)06-0113-07

一、引言

在当下的社会学研究中,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中产阶级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关系。可以说,如果不理解中国中产阶级发生的历史与逻辑,就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级才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然而,当下中国学界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多是从实证分析的立场,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中产阶级的职业、收入、消费等现象层面等,而忽视了中产阶级在社会总体结构(即社会关系)中的地位问题。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目前学术界在讨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时,实际上面临着一个赖特所说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构成”之间的区别。正如赖特所指出的,在“阶级分析中,阶级结构和阶级构成之间的区别是阶级分析的基本、但常常是隐含着的区别”“阶级结构指的是个人参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结构,这种结构决定着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构成指的是阶级结构中以该阶级结构所形成的利

益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群体的构成。阶级构成是可变的”。^[1]由此可见,“阶级结构”的重心在于社会关系,更进一步说则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阶级构成”的重心则在于群体的具体构成。在目前的社会阶级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中,大部分的社会学者都是采取“阶级构成”的研究视角,其社会分层的研究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类:(1)依据财富、身份和权力,如韦伯的《经济与社会》;(2)依据权威关系,如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冲突》;(3)依据职业地位,如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合著的《美国的职业机构》;(4)依据声望(财富、收入、职业、家庭背景等),如美国社会学家沃纳对美国的一座小城扬基城(Yankee City)的研究;(5)依据劳动技术分工,如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6)依据权威和技能,如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怀特的《阶级论争》和《阶级计量——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7)依据人们在就业关系(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单位)中的位置,如新韦伯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社会学家高德索普的《高德索普阶级模式》;(8)依据职业、收入和财产、

收稿日期:2014-06-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JC710055)

作者简介:王浩斌,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理论。

文化教育水平,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帕塞隆、布东、孟德拉斯等人,他们在研究社会分层时不约而同地把这三个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并把研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结合起来^①。总体上看,西方学者与中国社会学界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基本上是按照赖特所指出的“阶级构成”的理论范式,这一理论范式主要是考虑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群体构成。由于现实生活中群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导致他们必然要采取多种标准来界定阶级与阶层,从而容易导致逻辑上的多重性,上述所列的8种社会分层研究方法就是其多样性的典型表现。

与当下社会学的实证分析不同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方法与历史的方法则是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既保持了逻辑中的一致性,又可以历史地、动态地把握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一方面,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唯一标准,这样就避免了把职业、收入、消费等多种指标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从而保持了逻辑的一致性。因此,本文采取了马克思的阶级视角,即从是否占有具有统治意义资源(生产资料)的角度来定义阶级,这也是赖特所说的“阶级结构”研究视角。根据这一“阶级结构”的研究视角,一个社会可以简单地分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以及处于中间位置的中间等级。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是倡导历史大视野与动态地把握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从西方现代社会的历史来看,正是由于处于社会中间地位的中间等级的崛起才导致了政治经济的大变革与现代社会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间等级是推动近代社会结构变迁的主体力量,是现代性历史的主体。从东西方“比较现代化”的理论关怀与历史大视野来看,西方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中间等级问题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换言之,中产阶级的崛起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社会转型问题。基于这一视角,本文拟梳理一下西方中间等级^②的历史与逻辑,以期为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提供一个现代性历史与理论逻辑的参照。

二、历史上的中间等级与市民阶层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处于社会中间层面的、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农民、工匠、商人和佣工,即柏拉图所说的工农商阶层。这个群体是当

时希腊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承担经济职能,与中世纪后期崛起的、处于封建贵族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市民等级所起的作用十分相近。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通过考察城邦政治,分析了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阶层性格和政治行为,提出了中产阶层执政的政治思想以及通过中间等级来协调社会各阶级关系的治国理念。从古希腊思想家关于中间等级的论述来看,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中间等级的政治经济功能,即发展工商业与稳定社会关系的功能。

然而,这还只是理论上的假设,真正体现中间等级政治、经济作用的是封建社会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而兴起的现代市民阶层,这也是近代意义上的中间等级。需要说明的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中间等级不同于20世纪现代社会的中间层级,他们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的不同历史时段相关。具体而言,封建社会后期的中间等级指的是市民阶层与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些人拥有一定甚至较多的经济资本,其实力远超过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小老板”;而20世纪后现代社会的中间阶级则主要由小老板和拥有一定文化与知识资本的白领构成。

然而,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中产阶级往往被人们直观地理解成“白领+小老板”,人们很少会将中产阶级与有一定实力的老板联系起来,这其实是历史语境的不同所造成的理解差异。而实际上,在中世纪后期,中等阶级成员并不仅是“小老板”,而是指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工厂主、商人、农场主。他们在早期被称作市民阶层,在政治上被限定在第三等级的地位。这些人处于有头衔的封建贵族的压迫之下,社会地位并不高,但他们相对于劳工阶层来说,又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处于社会的中间,因此被人们称为中间等级。

需要注意的是,近代的中间等级在其历史形成

^① 上述归纳的8种社会分层研究方法请参见陈义平:《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载《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② 从西方社会的历史语境来看,中间等级、中间阶级、中产阶级其实是指向同一个阶级群体,只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这样同一个阶级群体,在中文之中往往被译成不同的概念。在德文中,“中间等级”的写法是Mittelstanden,它翻成英文就变成了Middle class,而社会学界往往就把Middle class译成中文中的“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因此在本质上,中产阶级、中间等级、中间阶级其实是一个意思,中国学界之所以采用中间等级、中间阶级、中产阶级等概念,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相关。由于本文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立场,因此本着忠实于经典著作原文(马克思的原文是德文)的原则,采用的是德文中的概念“Mittelstanden”,对应的中文翻译就是“中间等级”。在下面的论述中如果不作特别说明,可以把“中间等级”与“中产阶级”这两个概念视作同一个概念来使用。

的过程中有多种表述,分别是:Burghers Class、Middle Station、Middle Class,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语境,现代的研究者往往忽视与这些概念所对应的特定历史语境,从而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产阶级理论研究的混乱。在德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处于社会中间等级的群体主要是指“市民阶级”,它的德文原词是“Bürgerliche”,其所对应的中文翻译即可指市民等级,又可以指资产阶级。在德语中,市民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同一个词,这实际上反映了在某一个历史时段上,资产阶级与中间阶级实际是指同一个社会群体,也就是本文所分析的中间等级。这个概念的双重内涵,实际上反映了欧洲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在封建权力的压迫下,他们是社会的第三等级;当他们取得政治革命的功能后,便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近代历史上,中间等级概念与市民等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具有异质同构性。

关于中间等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的异质同构性及其复杂的历史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行了严格的界定;然而,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由于从两极阶级对立的立场,把《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者狭隘地理解成夺取政权的、残酷压迫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而不是理解成一个历史的、动态发展的社会中间阶层,从而大大地遮蔽了马克思中间阶级理论的丰富内涵,本文在此稍作分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回顾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后,用一句话概括了从市民到资产者、从市民等级到资产阶级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2]273}。这是从阶级状况动态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中间等级;接着,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与生产方式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中产阶级发生与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段,以此来对中间等级与资产阶级进行历史与逻辑的界定。

在历史上,中间等级的第一个阶段是市民阶级的萌芽阶段,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在封建社会“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中,“随着城市的出现……在这里的居民第一次划为两大阶级。”^{[2]104}这两大阶级就是师傅和帮工、有产者和平民。在封建社会中,师傅和帮工、有产者和平民是作为一个市民阶级而存在,他

们此时是封建社会的中间等级,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中间等级的重要特性之一。中间等级的第二个阶段是“工场手工业阶段”,此时现代的市民阶级开始形成并壮大,真正意义上的阶级从此时开始发生,即市民阶级发展成资产阶级。此时的社会的中间等级开始分化,阶级开始形成。随着交往的扩大和“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直接后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分的产生”^{[2]108}。“当十五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大广大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在最主要的先进的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里,手工业就为工场手工业所代替了”^{[3]445-446}。当工场手工业代替了手工业之后,中间阶级便开始进一步地分化,即原来的“行会师傅”被排挤出历史的舞台,马克思因此指出,“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行会——引者注)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2]273};而中间等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①。”^{[3]445}

中间等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大工业阶段,此时的市民阶级已经发展成资产阶级并且夺得政权,此时“产业军的统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即现代资产阶级取代了原来的中间等级。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中,社会阶级结构必然会出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在机器广泛应用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方式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原来的中间等级——市民等级——必然会出现内部的分化,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说的,“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4]“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2]273};而中间阶级的下层则会破产和落入无产阶级的境地。总之,在近代以来,由于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的加

① 此处的“市民等级”其实是指“资产阶级”。因为在德文中,市民(bürgerliche)一词既可译成中文的“市民”,也可译成“资产者”,根据上下文语境,笔者以为,此处的市民等级应当译成资产阶级,因为马克思明确指认他们是“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从历史上看,“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就是资产阶级。关于市民等级与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逻辑区别与历史分野,请参见笔者《马克思中产阶级理论的历史与逻辑分野》(《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5期)一文,在此不再赘述。

剧,出现了资本集中的趋势和大鱼吃小鱼的竞争结果,传统的中间阶段即小资产阶级开始全面走向没落,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便来临了。

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 市民阶级的兴起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显贵集团的教士和以自己的劳动供养以上两个阶级的农民”^{[5]508}。有学者形象地指出,“中世纪流行着一个简单的阶层划分公式,把人们分为战斗的、做工的和祈祷的”^{[6]4},分别对应的是贵族、农民和教士。在这种基本的社会结构中,贵族以及教士阶层,与农民阶级构成了两个基本对立的阶级结构,其中处于上层的是贵族阶层,处于下层的是农民阶级。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反,“在中世纪,贵族的命运是多变的。旧的贵族世家会因权势削弱、财富减少或无嗣继承而退出贵族集团。由于贵族的人员经常变动,所以15世纪以后欧洲的君主们不得不常常统计贵族的人数,以确定他们的地位”^{[6]5}。欧洲的贵族可以简单地分为大贵族和小贵族两类,“大的贵族是公爵、侯爵和伯爵,这些人常被称为诸侯,他们管理一个很大的地区,小的贵族主要是指骑士。他们主要以军事为职业,为国王和大贵族服务”^{[6]3}。在中世纪后期,“严格意义上的欧洲旧贵族已随封建社会的瓦解而走向衰弱,而各种新兴势力又不断步入上层社会的舞台”^{[6]6}。

在贵族的命运变化与贵族阶层的社会流动过程中,小贵族首先受到资本主义新兴工商业阶层的冲击。如果把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和希腊时代的城邦公民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小贵族其实类似于希腊城邦的中间等级;如同城邦中的中间等级是希腊民主制的支柱一样,中世纪的小贵族则是欧洲军事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当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兴起以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这部分旧社会的中间阶层,经济上的困境使小贵族和骑士们已不可能再履行个人的军事服务,他们为生活所迫甚至公开抢劫^①,这导致了封建贵族制度的解体。“贵族制度瓦解的另一个表现是,贵族在经济上走向衰弱。大贵族依靠传统势力和实力,作种种挣扎的努力。中小贵族则开始完全没落,沦为一般地主,甚至穷人。这标志着贵族作为一个社会等级,已经面临崩

溃。”^{[6]130}“贵族在经济上主要受到两次严重打击。一是农业危机的打击。当人口下降后,城市人口减少;饥荒过去后,农业品价格下跌。粮食价格下降的速度超过其他的物品。贵族即使想支付高的工资也不可能。一些人在财政上崩溃了,另一些人在战争中丧生。二是受商品经济的打击。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地产、地租和法律审判所收的罚金等。16、17世纪时这些贵族仍然过着奢侈生活。有三件事情毁灭了贵族:金钱、奢侈和战争。和平之时他们奢侈享受,战争之时他们因无金钱储备只好抵押磨坊和地产,1492年后货币租普遍流行,城市居民从贵族的地产抵押中获得成千上万的金币。”^{[6]130-131}。

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而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中间阶层——资产者阶层则开始步入了上层社会的舞台,引发了剧烈的社会流动。在中世纪后期即14、15世纪,出现了大量社会地位迅速提升的例子,一些人是从“商人中间等级上升到贵族社会顶层”“更经常出现的是平民—富裕农民和城市商人一向小贵族的流动。对这些小人物而言,中世纪晚期的军事和政治环境同样有利于社会流动”“在15世纪的法国,富裕农民家庭轻而易举地进入贵族阶层,其途径只不过是获得封地、加入当地豪强地主的侍从行列”“快速而不正常的流动,同样是15世纪英国社会的特征,1450年到1500年,大约1/3小有成就的伦敦商人的后代成为拥有地产的绅士”^[7]。资产者阶层的崛起改变了贵族与农民对立的二元阶级结构,使得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贵族、资产者阶层、农民”这三个层次的阶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资产者阶层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因此也被称为中间阶级。这个资产者阶层最初是由手工业者发展而来

① 旧制度下的中间等级既可能是原制度的支柱,也可能是原制度的破坏者,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小贵族开始是旧制度的支柱,但随着他们在经济上陷入破产境地后,就成为了封建制度的破坏者,正如学者所指出的,“15、16世纪的社会动荡给中、小贵族的公开掠夺提供可能,这样,骑士又变成了强盗。‘皮领强盗’即是一例。百年战争时期,骑士获得了机会。在战争休战期间和战后,这些无所事事的贵族就结帮派拉派,成为一伙到处抢掠的武装匪徒,被称之为‘皮领强盗’。皮领强盗主要是贵族,因为只有贵族才被允许穿戴皮制衣领。这些皮领强盗到处杀人越货”(朱孝远:《中世纪欧洲贵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136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新中产阶级也一样,在战争之前,他们是社会和谐和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冲突的重要力量,但随着德国的战败和经济凋敝,他们则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这说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中间阶层,他们的繁荣构成了这个制度的基础,他们的衰败则会埋藏这个制度,希腊的中产阶级是如此,欧洲中世纪的小贵族是这样,20世纪的德国新中产阶级也还是如此。

的。10世纪到11世纪,“在德意志从事手工业的基本上是农业人口”,因此最初的手工业者“尚未摆脱与农业劳动最后的联系”^{[8]111-114}。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工业者内部分化成师傅与帮工这两个阶层。师傅由于具有市民身份,从而拥有市民权(类似于希腊罗马时期的公民权)。这些市民(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是“得到城市习惯和国王立法的承认和保护”^{[8]133},“封建制度把资产者改造成一个有身份规定的等级。这不是一个有财产即成为其成员的集团。资产者的身份经过了一定的演变,习俗规定也经过一些变化,立法则把这种演变制度化地规定下来。在欧洲中世纪一段时间里,要想成为资产者,就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在法国的波尔多,要进入资产者阶层,就必须在城里居住一个月以上,在城里拥有‘房产、住宅和家庭’,缴纳居留税”等一系列条件^{[8]132}。随着经济的发展,师傅这个群体的财产不断积累,逐渐发展成资产者,而帮工则发展成无产者,而圈地运动又使失地农民不得不进城打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队伍的成员。这样就导致封建社会贵族(包括教士)与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渐演变成“贵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种三元的社会结构^①。总之,中世纪后期的资产者已处于社会的中间位置,与贵族和无产阶级一起构成一个三元的社会阶级结构。

四、城市化与市民阶层的壮大和 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

前文分析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中间阶级的产生是与市民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而这个市民阶级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的产物,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在城市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在中世纪后期,所谓的市民等级在英、法、德有不同指称,在英国叫做“Burghers Class”、而在法国则是“Bourgeoisie”、在德国则叫做“Bürgertum”。这三个词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根即“Bourg”。而“Bürg”指的是“城镇”。这反映出当时的中间等级概念与城市密切相关,换言之,只有城市中的市民阶级才是真正的中间等级。由此可见,最初的中间等级与城市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以及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

所谓的城市化,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质是以市场方式使人口和资源在城市空间中集聚,其最

初的兴起与自治城市的产生相关。据史料记载,最初的城市自治发生在公元10世纪,“967年塞纳河畔莫尔维尔城的自治证书。当时该城居民归神圣罗马帝国管辖,不是法兰克国王的臣民,他们要求摆脱农奴身份”,于1007年获得了特许自治证书,住在这个城市的自由居民免除了向贵族的赋税^{[8]122},这些自治城市的市民成了早期的资产者,也就是封建社会中最初的中间等级。到了中世纪后期,大致在11世纪至13世纪,西欧各地的城市自治运动吸引了许多逃亡农奴,使城市人口增加、城市数量也大大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剧。英国是最早进行城市化的国家,在14世纪,英国拥有大大小小各类城镇550个左右,伦敦也由《末日审判书》时期的1万人增加到5万居民^[9]。到了伊丽莎白女皇统治的时期,英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由商人和工匠所构成的中间等级,他们主要是由中世纪的商人发展而来的工商业资本家和拥有特殊技能,能为市场经济提供专业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士,这便是Middle Station这个概念所指认的群体。

15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加速了英国城市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中,新技术的发明和新式交通工具的广泛应用,把欧洲各国联接成一个密切相连的工业整体,统一的市场开始形成,“工业革命通过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史无前例地提高了生产率”^{[5]495}。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动力,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从封建时代的以庄园为主的分散状态向现代以城市为主的集中状态发展。生产与消费逐渐集中到交通便捷的城市,中世纪以来的市镇借机成长起来,城市规模日益扩大、数量增多。工业革命不仅导致了生产技术的变革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使得以市场(经济力量)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确立,带动了农村剩余劳

① 与西方的三元社会结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长达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没有市场经济所造就的中间等级,因此中国社会一直是维持一种地主与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历朝历代的革命只能是农民对地主统治阶级的造反,其最终结果也只能是沦为改朝换代的造反运动,而不是改变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社会的最大差异在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社会造就了一个新的中间等级,而中国恰恰正是缺乏这样一个中间等级;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下层精英人士既无法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向上流动,也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中间等级和独立的意识形态,只能通过认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以读书做官的方式加入统治集团,这样就消解了底层民众的革命力量与底层设计能力,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数千年维持不变。在西方,正是由这个中间等级发动了文艺复兴、思想启蒙、技术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行,推动了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封建小国走向全球化。

动力向城市转移,使非农就业的比例越来越大、城市人口的在整个社会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以最先实现现代化的英国为例,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跃升到51%,初步实现了城市化^[10]。

工业革命不仅使欧洲城市的人口进一步增长,“还引起了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因为城市居住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5]495}。这种全新的城市化生活、市场化体制和工业化生产,使英国中间等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迅速增长,壮大了他们的力量。同时也使英国原先繁复的社会等级逐渐演变成贵族阶级(Gentry Class)、市民(资产)阶级(Burghers Class)和劳工阶级(Working Class),并形成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Upper Class)、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下层阶级(Lower Class)^[11]。中间等级的茁壮成长,反过来又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间等级促使城市功能形态发生变化,出现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的功能分区,从交通方式到居民居住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中产阶层及社会精英迁居城郊或郊区的独立、半独立式住宅,使城市发展出现了郊区化趋势;此外,中间等级的壮大,还促进了城镇管理走向民主^[12]。

在此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中间等级逐渐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与此相应的是居住在乡村的贵族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衰落,势力日渐衰弱。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纯粹的根据政治身份来确定社会地位的制度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所破坏:一方面,一些封建贵族由于经济上的破产,实质上已落入社会底层,“没落贵族”这一术语是对这些人社会地位变迁的最好写照;另一方面,资产者发财而成为贵族。到了19世纪50—70年代,英国出现了庞大的处于中间地位的中产阶级集团,大商人、银行家等等最富裕人群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地主中的大富翁数量。正如有学者指出,“被工业革命推上权势顶端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中大多数未曾经商,更不是贵族,没有光荣的族谱和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祖父曾种过地,他们的父亲破了产,他们自己则穷困潦倒,漂零半生。在工业革命的风暴中,他们凭自己的创造才能取得发明专利,更凭精明的计算和心狠手辣开办工厂,在社会财富的梯级上越爬越高,成为万人瞩目的大富翁。他们往往被称做‘暴发户’或‘中产阶级’。”^[13]

这些人处于中间等级的中上层,被称为“富裕的中产阶级”,用马克思的说法便是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条件优越,迫切追求一定的政治地位,治安法官和议员即从中产生,也正是他们主导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除了上层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外,市场经济体系还催生了许多独立谋生的零售商、小工厂主等“小老板”,他们构成了中间等级的下层,用马克思的话来形容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前,富裕的资产阶级和经济状况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一样,都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力,因此被称为第三等级。后经过革命的洗礼,作为市民等级的第三等级变成了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变成了“管理资产阶级公共事务的委员会”,马克思正是基于这一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指出封建社会转型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

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成就了上述那些被称作“暴发户”或上层“中产阶级”的实业家,而且还产生了大量的管理和服 务阶层,即所谓的白领——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城市化社会的管理需要一个庞大并且组织严密的系统,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各种商业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张,这些越来越大的机构需要雇佣大量的管理服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士,如各层次的管理人员以及会计师、律师、医生、工程师、艺术家、股票地产经纪人等专业人士,这导致中下层中阶层不断发展壮大。这些中下层的中间等级与一无所有、没有文化、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不同的是,他们拥有特殊的、现代城市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中获得一杯羹。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2]275}。只是,他们与富有的资本主义工商实业家相比,这些人只处于中产阶级的中下层次,后来当传统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衰弱以后,他们便成了新的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法国情况与英国类似。法国社会的上层阶层按其身份分成了第一等级的僧侣和第二等级的贵族,第三等级就是所谓的市民阶级,包括实业家及银行家、律师、医生等中上层的中间等级以及工匠、小店主等中下层中产阶级,由于经济的发展,他们获得了某种政治上的身份。在法国大革命前,由三个等级所组成的三级会议反映了市民等级已经开始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力,而在法国大革命当中,第三等级则充当了革命的主力军。

对于这个在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进程中爆发起来的中间等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这个中间等级作了如下解释:“英语中的 Middle-classes (或通常所说的 Middle Classes),它同法文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所谓的与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14]而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中间等级则被明确地描述成“资产者”,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资产阶级”一词以及其所负载的观念、意识形态、争论等皆由此引发。从社会阶级结构的视角来看,这个资产阶级其实是处于社会的中间层次,可称之为中间等级或者中产阶级。这个中间等级作为一股最要的社会力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甚至是最根本的力量。从市民阶级在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中所展示的力量,以及在工业革命中所发挥的经济作用,可以说中间等级是社会、文化和经济向现代转型的先驱和代表。各个国家在现代化路径上的选择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与中间等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①。

参考文献:

[1] 埃里克·欧林·赖特. 阶级[M]. 刘磊, 吕梁山,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11.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89.
[5]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朱孝远. 中世纪欧洲贵族[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7] 德瓦尔德·乔纳森. 欧洲贵族[M]. 姜德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3.
[8] 沈汉.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 20 世纪[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8.
[9] 谷廷方. 重评圈地运动与英国城市化[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08(4): 35-39.
[10] 赵煦. 英国城市化的核心动力: 工业革命与工业化[J]. 兰州学刊, 2008(2): 138-143.
[11] 周晓虹. 全球中产阶级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7.
[12] 陆伟芳. 英国中产阶级与 19 世纪城市发展[J].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3): 113-118.
[13] 钱乘旦. 论工业革命造成的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M]//中国英国史研究会. 英国史论文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107.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80.

(责任编辑: 刘浩)

Rise of Middle Class and Change of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WANG Haobi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middle class or middle stratum is usually intuitively understood as “white collar and petty employers” by people,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bourgeoisie are seldom associated by people, a misconception actually caused by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 In fact,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he members of the middle class are not only “petty employers”, but also refer to factory owners, businessmen, and farmers growing out of market economy, capitalism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y are called public class or bourgeoisie in the early time. The townsfolk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y are the pioneer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modern social transformation. Middle class, as an important social force, play an important, or even the most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society to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a sense, they are the incarnation of modernity.

Key words: Middle Class; Middle Class; Bourgeois;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① 在 15—18 世纪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国家现代化路径与中间等级的发展之间存在重要关系。在英国,中间等级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兴起,然而通过渐进式的政治改革逐渐掌握权力;在法国,中间等级则是通过比较激烈的政治革命,从处于社会第三等级的市民等级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